

孙玉良 编著

渤海史料全编



新平解

PDG

渤海史料全编

92
K289
9

孙玉良
编著



北京
圖書館
藏書

932249

新平解

PDG

(吉)新登字07号

BOHAI SHILIAO QUANBIAN

渤海史料全编

孙玉良 编著

责任编辑: 孙宝文

封面设计: 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4插页 396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印数: 1—700册 定价: 11.0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597-7/K·240

新华书店
PDG

前 言

公元六九六年，正当唐朝武则天统治后期，东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不堪忍受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残酷封建民族压迫，终于爆发了以契丹上层人物李尽忠、孙万荣为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斗争。同契丹相邻的粟末靺鞨部，在大祚荣父子等人领导下，也投入到起义者的行列，乘起义之机，率部东归，创立政权，拥兵割据，以便从同唐朝的隶属关系中，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但是，这个政权始终未独立于唐朝中央集权统治之外，而是继续置于中原皇朝管辖之下。它先后接受了武则天和唐中宗的招安，并严格遵照朝廷册拜的封号，于六九八年始称震国，七一三年专称渤海。七六二年，朝廷又晋封其为渤海王国。历代诸王，一一归依中原皇朝。两唐书《渤海传》，对此均做了记载。至九二六年，渤海被契丹攻灭，历时二百二十八年。在其存在期间，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显著贡献，被誉为“海东盛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渤海是以靺鞨人为主体的民族所建立的封建地方割据政权。靺鞨人是我国境内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世居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尽管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靺鞨族的称谓互不一致，但古籍中对靺鞨族的来龙去脉、兴衰演变却记载得清

清楚楚。从古代传说至西汉时期，一直称靺鞨族的先世为肃慎；东汉至两晋，有时继续沿用肃慎的旧称，有时又将肃慎改称挹娄；南北朝时称挹娄为勿吉；隋唐之际又称勿吉为靺鞨；宋代及其以后出现的女真族和满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唐代靺鞨族发展而来。值得告慰和骄傲的是，对于靺鞨族悠久多变的历史，中国历代史官都把它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使我们今天对渤海历史的研究，具有更充分的发言权。

我国古籍中对渤海历史做了较全面记载，为渤海史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史实根据。在日本和朝鲜的古籍中，对渤海同二者的交往，也分别有所载录。特别是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间接地反映了渤海社会各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记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渤海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丰富了对渤海史的直观认识。在今日苏联和朝鲜境内的渤海领域，考古发掘工作也有所进展，进一步证明渤海所辖地域十分辽阔。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史学界前辈，遍览中外载籍，对渤海史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撰成专著，影响很大。先后有唐宴《渤海国志》四卷，黄维翰《渤海国记》三篇，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特别是金毓黻先生，对渤海史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尝试。

当前，随着渤海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以及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渤海史料做一番重新整理，使之更加全面和系统，给读者以较完整的概念，对于从事渤海史研究者，具有更为实用价值。只有在全面系统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才能还渤海历史的本来面貌。

中国历代史官,在撰修中国史书时,一直把渤海史作为修史的内容之一而载入古籍之中。上自前代先世,下迄亡后遗裔,分别为之立传 据实加以著录。直接或间接载有渤海史实的古籍多达百余种,其中包括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类书、总集、政典、地志、文选、诗集、小说、笔记。此外,还曾有过《渤海记》^①一类的专著,使渤海许多重要史料得以保存下来。尽管《渤海记》这部专著久成佚书,但在其它古籍中,仍可间接看到其中的部分内容。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当中,有关渤海史的最基本文献资料,首先是《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以及散见于该两书《纪》、《志》、《传》中的渤海纪事,它们成为后世著述渤海历史的重要依据。通过对两唐书《渤海传》在内容上的比较,明显看出新书应用了旧书所不曾采纳的史料,对渤海史内容作了重要扩充;而且对旧书在叙事上语意含混,言有未尽之弊,又作了必要弥缝。例如《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开头称:“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颇为费解,对渤海族属到底是靺鞨人,还是高句丽人,很容易引起歧义,难于据此做出结论。只有看过《新唐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的记载以后,才能豁然明了,渤海政权为粟末靺鞨人所建立,历史上,粟末靺鞨部曾依附于高句丽王朝。又如,对大祚荣父子参加契丹人发动的起义之后,率部东归,以及接受朝廷招安,建立震国的始末,旧书也不如新书记载得详尽清楚。

但是,新书记载朝廷对渤海的册封,以及渤海对朝廷承担的

^① 《新唐书·艺文志》载“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而《东都事略》卷十八和《张建章墓志》等,均作《渤海记》,无国字。

义务，反而不如旧书详细，或者因已有旧书在前，为避免过繁而有意简略。就渤海史整体而言，新旧两书恰好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有关渤海史的纪事，更接近于完整、准确。

近年来，由于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建章的墓志被发现，使我们确切地获得了《渤海记》的内容概要，该书“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品官”等^①，以及《渤海记》成书后广泛传播于世的盛况。这就说明了宋代欧阳修等人在撰写《新唐书·渤海传》时，很容易见到《渤海记》这部专著，并根据该书所记，有意对《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的内容做了新的补充和订证。金毓黻先生在比较两唐书《渤海传》内容的异同时，曾论及新书“详于追谥、年号，又载地理、官制、物产、品秩之事，取材视旧书为多，盖取材于张氏^②。”这一论断，同《墓志》中反映的《渤海记》内容，完全相符，表现出金先生对渤海史研究的真知灼见。最近佟柱臣同志在考证《张建章墓志》时，也指出：“《新唐书·渤海传》赖张建章《渤海记》而丰富，张建章《渤海记》以《新唐书·渤海传》而得存，从《新唐书·渤海传》中可以窥见张建章《渤海记》原貌，海东盛国的历史也因张建章《渤海记》而得传，所以张建章《渤海记》对于保存渤海国史料，是作出了巨大贡献”^③。这段论述对《渤海记》的史料价值，以及同新书《渤海传》的关系，给予了充分肯定。

《新唐书》全部写成时为一〇六〇年，虽然距渤海亡时已一百三十多年，但张建章却是渤海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并将他所了解到的史实载入《渤海记》中。从《墓志》上可知，张建章曾于唐

①《张建章墓志》，见徐自强《张建章墓志考》，《文献》1979年第二期。

②《渤海国志长编》卷一九

③佟柱臣《渤海记作者张建章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创刊号。

文宗朝以瀛州司马身份衔命渤海，自“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濤万里”，至“九年仲秋月复命”，即从唐文宗大和七年秋至九年秋，公元八三三至八三五年，在渤海作了首尾两年的实地考察，所收集到的资料“盈溢细帙”。足见《渤海记》是在做了长期考察之后，并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堪称是渤海史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新唐书·渤海传》虽然成书较晚，但它取材于《渤海记》的史料，却出于渤海同时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现今所保存下来的渤海史纪事中，《新唐书·渤海传》是权威性的著作。

既然断定《新唐书·渤海传》中的诸王年号、追谥源于《渤海记》所载，那么，自第十一代王大彝震以后五王无追谥，自第十二代王大虔晃以后四王又无年号，据此可以断定《渤海记》成书于大彝震之世，更确切一点说，当在八三五年秋张建章从渤海回幽州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对此后的渤海史事，《渤海记》中不可能有所记载，而《新唐书》也只好从其它文献中去取材。

以往有的学者，依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认为渤海至第十三代王大玄锡时，才发展成海东盛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谓盛国的含义，无非是指经济较以前有明显发展，领域较以前有所扩大。但该传所载渤海疆域已到了极限，物产已很丰富，并被认为是取材于《渤海记》，所以在王大彝震时或之前，渤海已具盛国规模，这较王大玄锡时代要早。考于其它古籍所载，这些盛况自大钦茂时就已奠定了基础，开始走上繁荣时期，因此在他死后谥为文王，反映出当时渤海社会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至第十代王大仁秀时，当为渤海的鼎盛时期。《新唐书·渤海传》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按一般历史规律，凡对外大举用兵，必须有强大的经济条件作保障，大仁秀讨伐的是诸部，不是一部两部，其规模一定很大，也当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说明渤海在大仁秀时经济会有较大的发展，财富会有一定积聚，并在

对外征战中取得了开大境宇的胜利，具备称为盛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不可能是在大玄锡时渤海才发展成盛国。所以对《新唐书·渤海传》中的某些纪事，不可一律不作分析地机械理解，要把具体历史事件具体分析的原则贯穿始终，才能做到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现今保存下来的渤海史料，属于直接出自唐代人之手的不多。我国第一部载有渤海纪事的古籍，为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即公元七九五年）杜佑编纂的《通典》。但是该书为辑录前代掌故成篇，鲜有编者个人著述。因此对同时代的渤海纪事，仅是在卷一八〇标注安东府方位时，才提到“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一语，其余不曾涉笔。与杜佑同朝为官的宰相贾耽，根据时人所述，亲作调查，著有《边州入四夷道里记》等书，保存在《新唐书·地理志》中的某些段落，详载了渤海至朝廷的朝贡道和营州道，所经路线、里程，犹可确指，为后世标定渤海部分府州方位，提供了可靠依据。晚唐时苏鹗所著《杜阳杂编》中，对渤海所献玛瑙柜和紫瓷盆作了描述，但也仅是寥寥几句。篇幅略长一点的是唐代保存下来的诗文，共有二十首左右，其中尤以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为珍贵，记载了渤海与朝廷“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①的重要史实，证明双方始终共处于统一的国家之中，是检验两者关系的最有说服力的史料。

五代时，载有渤海史料的古籍，主要是《旧唐书》，该书完成于九四五年，距渤海亡时仅十余年。但是，因刘昫等人是在战乱中仓促成篇，对渤海史事更是无暇鉴别和收集，致使象《渤海记》这样重要著述，竟然不曾引录，同后来的《新唐书》相歧异，是必然的结果。

宋代是载有渤海史料的古籍大量涌现时期。在《新唐书》未

^①、《温飞卿诗集笺注》卷九

编修之前，王钦若等人已于宋真宗朝编纂成《册府元龟》这部庞大类书，所载渤海纪事十分可观，多达二百四十余目，并一一系以年月，分类辑录，将其汇集起来，完全可同两唐书《渤海传》相匹敌。从这些史实记载中，再现了渤海与唐朝“车书本一家”的亲密关系，共同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封建文明。此外，成书于宋代的《唐会要》、《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重要历史著作，都从不同角度保存了部分渤海史料。至于象《松漠纪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历史笔记，也是渤海史料来源之一。

元朝时，对唐代历史很少有人撰述，因此与渤海史有关的古籍不多，只是在元朝宰相脱脱领衔编修的《宋史》和《辽史》中有所著录。尤其是《辽史》，对契丹攻灭渤海始末，以及渤海地志等，较其他古籍所载为详，使对两唐书《渤海传》记载太略之憾，聊可为慰。

明清之际的古籍，有关渤海史的著述，均系转引、考证之作，一般不独立具备史料意义，但对渤海史研究，却具有很多参考价值。

在探讨渤海史发展过程，弄清其来龙去脉时，往往要涉及其先世族源演进和亡后遗裔归向等问题，我国古籍中有关这些方面的史料，也很丰富。古籍中按照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等序列，一脉相承下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秦汉及以前的古籍，称渤海的祖先为肃慎。上自《尚书》、《左传》、《礼记》，下至《史记》、《汉书》、《淮南子》等，皆载有肃慎纪事。其特点是这些古籍的编纂者，对肃慎族的历史知之不多，仅就其与中原各族的关系，掇其要而载之。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远在史前尧舜禹时代，肃慎族就已归附中原部族，肃慎之地已纳入中国版图。《大戴礼记》卷十一载：“虞舜以天德嗣尧”，“肃慎来服”；《国语》卷五载：至周武王时，“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左传》卷二二载：公元前五三三年，周景

王重申肃慎“吾北土也”。足证渤海先世同中原的一体关系源远流长。

后汉至两晋时期，古籍中称肃慎为挹娄，并首先在《后汉书》中有了渤海先世的第一篇传记《挹娄传》，系统地叙述了肃慎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概况。在《三国志》中，也载有《挹娄传》，其内容与《后汉书·挹娄传》雷同。但是，《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所以《后汉书·挹娄传》当为因袭《三国志·挹娄传》而作。再后的《晋书》中，仍将挹娄称为肃慎，载有《肃慎传》，除了复述《三国志·挹娄传》所载内容之外，又记录了肃慎人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史实。从后汉至两晋，古籍中常将肃慎与挹娄并称。

南北朝时，古籍中又改称挹娄为勿吉，《魏书》与《北史》中皆载有《勿吉传》，内容较以往古籍中的肃慎或挹娄传更充实。从中可以看出勿吉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历史阶段性的变革，有的部落已拥有武装力量，完成了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并经过长期武力兼并，最后形成七部，各有酋长，不相总一。此时勿吉与中原的往来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据《魏书·勿吉传》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勿吉曾贡马五百匹；十七年，即四九三年，又遣婆非等五百余人来朝献。对加速各族的共同发展，无疑带来促进作用。

隋唐时，古籍中又称勿吉为靺鞨，《隋书》中有《靺鞨传》，两唐书中除有《渤海传》外，又分别有《靺鞨传》和《黑水靺鞨传》。从两唐书中将渤海与靺鞨同时立传的事实来看，也证明渤海未能从始至终把靺鞨族统一起来，《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云：“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言外之意，未盛或盛而后衰时，靺鞨就不全为渤海所统辖。

总之，以上四个阶段的古籍，为研究渤海先世及兴起的历

史，提供了必要的史实依据和线索。

渤海亡后，古籍中对其遗裔的历史也有一些记载，主要见于宋元之间编修的古籍。诸如《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辽史》、《金史》、《宋史》等等。这些古籍，一是记载了渤海遗民反辽复国、发动起义的斗争经过；二是记载了渤海上层人物及后裔仕辽为官，助金灭辽，成为辽金两朝统治集团重要支柱的史实；三是记载了宋朝统治者借助渤海遗裔力量，同辽金抗争的情景。

在渤海遗裔反辽斗争中，声势较大的有：九七五年，燕颇据黄龙府起兵反辽，随后以乌玄明、乌昭度一族为首的渤海遗裔，保聚方隅，守节不降，前后建立起定安国、乌舍国，与辽抗争了七、八十年。一〇二九年，大祚荣的裔孙大延琳据辽东京起兵称王，建立兴辽国。一一一五年，又有古欲据饶州起兵称王。一一一六年，渤海右姓遗裔高永昌也据辽阳起兵，自称大渤海皇帝，旬日间连克辽东五十余州，声势十分浩大，加速了辽朝的灭亡。《辽史》中对这些事件的记载，都比较详细。

古籍中所载渤海遗裔仕于辽金有姓名可考者百余人，其中辽金王室纳大氏后裔为妃者六人，位居卿相者九人，尤其是高模翰仕辽以后，屡建战功。《辽史·高模翰传》载，辽太宗曾亲谕高模翰曰：“朕自起兵，百余战，卿功第一，虽古名将无以加”，并指高模翰对群臣说：“此国之勇将，朕统一天下，斯人之力也。”先后授高模翰加特进、检校太师，封遼郡开国公，迁镇中京，加开府仪同三司，召为中台省右相，后迁左相。据《金史》列传载，居住在辽阳的渤海遗裔张浩、张汝霖父子兄弟先后为金宰相，一族数人，同居要职，成为金朝赖以实行统治的依靠力量。渤海遗裔对宋朝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虽然不如对辽金两朝那样重要，但宋朝统治者利用渤海遗裔对辽“俱怀杀主破国之怨”的仇恨心理，“使之怀恩”，“愿报私

憾”，^①成为与辽抗争的借用力量。《宋史·定安国传》载：“太平兴国中，太宗方经营远略，讨击契丹，因降诏其国，令张犄角之势。其国亦怨寇仇，侵侮不已，闻中国用兵北讨，欲依王师以摅宿愤，得书大喜。”遂使辽北有后顾之忧，助长了宋对辽的对抗力量。总之，古籍中对渤海遗裔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都给予充分肯定。

元代以后，因渤海人已与东北各民族融为一体，古籍中很少还称某人祖先为渤海人。元代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氏族栏目里，将渤海同女真、契丹人等统称为汉人，成为汉人八种的组成之一。渤海遗裔，随着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之结束，而在古籍中消逝了。

至此，中国古籍对于唐代渤海的来龙去脉，作了全面交代，为后世对渤海史研究，准备了必要的史料。

三

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久为我国史学界所熟悉和应用。迄今所能见到的载有渤海史料的日本古籍，约有三十多种，其中大部分已重新刊入日本现代出版的《国史大系》、《群書類从》和《续群書類从》三大类书之中，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渤海存在期间，正是日本六部官修国史等古籍相继产生之际，对渤海与日本各时期的交往，分别有选择地被载入相关的日本古籍之中。如果按一日一事一纪的编年纪事法统算，有四百余条，弥补了中国古籍记载的缺遗，是研究渤海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日本第一部官修国史《日本书纪》，是记载六九七年八月以前的日本古代史。此时渤海尚未建立，只载录了渤海先世——当

^①《宋史》卷二六四。

时日本仍称其为肃慎的七条史事。其中最早的一条是五四四年，肃慎人已与日本有了接触，他们经常驾船出没于日本北部佐渡岛附近的海面上“捕鱼充食”，并“移就濑波河浦”^①，登上海岸，说明渤海先世在造船、航海、捕捞等方面有了较高发展水平。

日本第二部国史《续日本纪》，记载了六九七年至七九一年间的日本历史。在此期间，正是渤海与日本交往比较频繁时期，渤海先后十三次遣使日本，日本也向渤海派出使臣达十次之多，有一百多条与渤海有关的史事载于该书中。从这些记载上，清楚看到了渤海社会由武官专政到文官统治的重要过渡。以往《渤海国志长编》卷十等，把七二七年渤海遣高仁义、高齐德等二十四人通使日本，作为“两国通聘之始”。实际上根据《续日本纪》卷八记载，两国友好往来，是日本在先，渤海居后，早在七二〇年初，日本元正天皇就已经“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鞆国，观其风俗”，是为双方友好交往之滥觞。《续日本纪》中关于渤海纪事，在用词上错误颇多，较明显的是把渤海称作高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上是对渤海的历史不甚了解；主观上是存有欲使渤海修属国之礼，将渤海纳入日本势力范畴的政治企图。后因遭到渤海拒绝，在其它古籍中才纠正了《续日本纪》中的这类错误。

日本第三部国史《日本后纪》，原书四十卷，在现今残存的十卷中，记载了二十七条与渤海相关的史事，反映出从七九五年至八一一年双方各有四次遣使互访。《日本后纪》所佚各卷中的渤海纪事，在其它日本古籍中作了转录，仍保留下来。

日本第四部国史《续日本后记》，仅记载了与渤海两次遣使日本的有关史事二十五条。

日本第五部国史《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在其纪事时间内，双

^①、《日本书纪》卷一九。

方互无来往，只追述了两件与渤海相关的往事，一是渤海使臣精于相法，为日本显宦相面；二是日本致渤海国书，逸名家书写，表明很重视与渤海的交往。

日本第六部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是记载了八五八年至八八七年的日本历史。在这三十年中，渤海同日本的往来又重新活跃起来，先后五次遣使日本，有七十多条与渤海相关的史事被载入该书中。

日本载有渤海史料古籍，除六国史外，首先是太政大臣菅原道真于八九二年奉敕纂辑的《类聚国史》，将六国史中前五史纪事，分部辑事，类编聚成。后世又将《日本三代实录》的纪事增补进去，共二百卷，现今仅存六十卷，不足原书三分之一。但是记载渤海史事的卷一九三和一九四，幸好基本保存下来，惟卷一九四卷首小有缺佚，其余二百四十余目，一一在册。除因《日本后纪》缺佚，有三十余条纪事，在六国史中找不到对应条目外，其余皆可在六国史中找到出处。由此，又恰好以《类聚国史》中的渤海纪事，补足《日本后纪》中所佚渤海纪事。而卷一九四卷首所缺纪事，考于起迄年代，可以断定是出自《日本后纪》卷二十中的纪事，所幸该卷现今不缺，并恰好有渤海使臣高南容第二次出使日本的纪事，而《类聚国史》卷一九四卷首不载此条，无疑所缺者当为此一条。这样一来，日本六国史中的渤海纪事，经过与《类聚国史》对照，完全可以确信，至今全部保存下来，真是史料保存工作的一大奇迹。

六国史与《类聚国史》的纪事年代截止于八八七年八月，其后渤海与日本往来的历史事件，主要记载于《日本纪略》之中，该书大约撰于十一世纪初，六国史中有关渤海纪事，也绝大部分抄略在该书前二十篇中，并注明出处。后二十篇又称《九代略纪》或《九代实录》，其纪事也属抄略，但不标出处。从八八七年九月至九三〇

年三月，先后有三十多条纪事同渤海有关，分别载于该书前篇二十的后半部和后篇一中。至此，渤海与日本友好交往的历史，全部被记录下来，而保存在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也就比较完整了。

此外，在《扶桑纪略》这部日本古籍的残卷中，所载渤海使臣裴璆两次出使日本的纪事，较《日本纪略》详细。《日本逸史》中的渤海纪事，虽出于《类聚国史》和《日本纪略》，但个别条目为《类聚国史》所不载。见于《遍照发挥性灵集》中的僧空海代日本遣唐大使撰的致渤海王子书一事，因事情发生在唐朝，不一定为当时史官所知，故日本国史中漏载。《类聚三代格》和《延喜式》两部古籍中，还详载有日本接待渤海使臣的各种礼仪格式规定。在日本的一些古诗文集中，还保存有百余首与渤海有关的诗文，是研究渤海文化发展的宝贵史料，特别是渤海诗人的作品，至今仅能在日本古籍中见到，可称之为渤海文学艺术中的稀世珍宝。成书较晚的一些日本古籍，对与渤海有关的史事，虽也有叙述，但基本上是前代记载的复述，不独自具备史料价值。

日本古籍中所载数百条与渤海有关的纪事，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反映出渤海社会不同时期的真实发展情况。但是，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有些记载不尽符合历史实际，其中或为误传，或为误记，甚至人为扭曲也兼而有之。十分明显的事例是对渤海致日本的书状，大多数作了处理，原样保存的很少。

《续日本纪》卷二十一所载大钦茂致淳仁天皇的国书就比较典型，从其用词混乱不堪程度，可知已非原貌，是经史官加工后的产物。书中将大钦茂、使臣和史官的话混为一谈。《日本后纪》卷五，对日本史官的政治倾向性有所披露，称“渤海王所上书疏，体无定例，词多不逊。”但是，在日本古籍中所保存的渤海书疏，言词谦恭，格式划一，见不到有“体无定例，词多不逊”之处，显然是经过删削加工后载入史册的。所以在运用这些史料时，

也应有所分析和鉴别。

四

渤海史料见于朝鲜古籍的不多，而且象日本古籍中所特有之类的渤海史料，更是寥寥无几。尽管渤海与同时代的朝鲜古国新罗比邻，并同受唐朝封册、辖制，但彼此不发生横的联系，很少互相接触。因此，渤海的历史不为新罗所知，也就很难在朝鲜古籍中有所记载。同时，朝鲜古籍成书时间较晚，长期使用汉字，有关渤海纪事，基本是从中国古籍中转引而来，在中国古籍中仍能找到出处，这就自然降低了反映在朝鲜古籍中渤海史料的价值。但是，朝鲜古籍中对渤海先世同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的互相交往、攻伐，以及渤海亡后，其吏民和遗裔流徙高丽的记载，却为其所独有，同样是研究渤海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朝鲜第一部系统的古代史著作，是高丽王朝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成书于一一四五年。当时已是中国南宋时期，距渤海灭亡已有二百二十年。该书所载与渤海有关的纪事十一例，其中篇幅较长的六例，均为中国古籍所载的复述，余为出自朝鲜古籍的十分简短的一两句话，并经过分析判断后，才可以认定是与渤海有关的纪事。这十一条纪事，共同反映了渤海与新罗敌对的紧张关系。自从渤海兴起以后，不时威胁新罗北境安全，迫使新罗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一是“筑长城于北境”^①阻挡渤海南犯，二是协助唐朝，“发兵击靺鞨南鄙”，^②削弱渤海力量；三是遣使通好，缓和紧张关系。从《三国史记》纪事中可以看出，渤海与新罗的敌对关系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的。该书中有六十多条与渤海先世有关的纪事，其中多数是靺鞨入侵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的纪事，似乎在历史上渤海先世从未与新罗和睦相处过，而是征伐

①、②、《三国史记》卷八。